

中亚楚斯特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综述

林铃梅

关键词：中亚 费尔干纳盆地 楚斯特文化 彩陶 青铜时代

内容提要：楚斯特文化是目前已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最早的农业文化，年代在青铜时代晚期，即公元前2千纪末至前1千纪初，以手制彩陶为突出特征。楚斯特文化不仅对于认识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对于探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亚的考古材料及研究现状不够了解，导致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无法深入。近年来，对一些楚斯特文化遗址进行了重新发掘，获得了重要的新材料，修订、拓展了以往的认识，为楚斯特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楚斯特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将为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奠定基础。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北部、锡尔河上游，目前分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它是由多山围绕形成的三角形盆地，西北以库拉马、恰特卡尔山脉为界，东北以天山山脉的费尔干纳支脉为界，南边是阿赖山和帕米尔山的支脉。盆地西南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被称为“苦盏大门”，由此与图兰低地相连。卡拉河和纳伦河在盆地汇流成为锡尔河，孕育盆地中央的平原。锡尔河的支流在盆地周边形成大量的山区河流和河网，向盆地倾斜下来。水流从山谷流出，逐渐变缓，形成了典型的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积三角洲。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源、遍布的平原绿洲和山区垂直地带的生态环境，使得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农业人群和畜牧人群青睐的生息之地。

通过盆地四周的山间通道，它在东北与七河流域紧邻，东边与天山地区相接，东南通过阿赖谷地可以到达新疆西部，在西北通过山间通道可以与塔什干绿洲和哈萨克草原相连，东南经“苦盏大门”可到达古代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古代不同人群、文化、宗教、商贸聚

作者：林铃梅，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集之地，是东西方文明往来的十字路口。这里是古代大宛国所在，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与古代中国建立起了尤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它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环节，将中国与中亚甚至西亚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费尔干纳盆地的古代文化遗存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突出意义。

楚斯特文化是费尔干纳盆地目前所知最早的定居农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积累了大量该文化的材料，尤其在近年，人们对楚斯特文化遗址进行重新发掘，获得的新材料修正、拓展了以往的认识。笔者对楚斯特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奠定基础。

一、楚斯特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史

1939年，首次在费尔干纳大运河台地上发现了楚斯特类型彩陶片，但楚斯特文化的研究真正开展要到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楚斯特和达尔维尔津两处重要居址，其中达尔维尔津居址经多年发掘，成为楚斯特文化的标尺性遗址。楚斯特文化的研究开展至今已70余年，经历了对其文化面貌逐渐认识，并不断扩展研究方向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1950年，M. Э. 沃罗涅茨和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发现了楚斯特居址。1951年，由M. Э. 沃罗涅茨，随后1953～1961年，由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在此进行持续发掘。1952年，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在盆地东部发现了达尔维尔津居址，自1956年起持续发掘了16个季度。之后，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在卡拉河左岸发现了阿什卡尔特佩遗址，面积达13公顷^[1]。两座重要居址的发现、发掘，及随后在乌兹根绿洲、盆地北部和东南部发现的该文化的遗存，积累了大批重要材料，使人们得以初步认识楚斯特文化的面貌。基于这一时期发现的考古材料，众多学者都对楚斯特文化进行了研究，包括M. Э. 沃罗涅茨、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H. Г. 戈尔布诺娃、Б. А. 李特文斯基、B. И. 科普科娃、Ю. Г. 丘拉诺夫。这一时期的总结之作为1962年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发表的《费尔干纳的古代农业文化》一书^[2]，以及1963年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的副博士论文《楚斯特居址（青铜时代的费尔干纳历史）》^[3]。尤其是前者，汇总了已有的费尔干纳盆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发现及综合研究成果，初步建立起费尔干纳盆地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1974、1982～1983年，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主持对楚斯特居址进行了第二、三次发掘^[4]，旨在弄清遗址地层情

况。1976年,发现了另一处重要遗址——奥什居址,并在1976~1982年进行了发掘^[5]。这一时期,Б.阿卜都加孜耶娃、O.别列纳列耶夫、Ю. 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不同区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工作,扩展了人们对楚斯特文化分布区域的认识。到这一时期为止,发现的遗址已接近80处。70、80年代对楚斯特文化的各类遗存有更专门、深入的研究,如对房屋类型^[6]、防御工事^[7]、陶器形制、彩绘、石器^[8]、冶金^[9]的研究。综合性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包括1978年,Ю. 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的博士论文《费尔干纳楚斯特文化和中亚早期铁器时代遗存》汇总了以往发现的所有材料,从居址、房屋、防御工事和各类物质文化方面来阐释楚斯特文化的特征及其在中亚晚期彩陶文化圈中的位置^[10];1984年,Ю. 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和Б. X.玛特巴巴耶夫《费尔干纳楚斯特居址研究的主要成果(1950~1982年)》一文梳理楚斯特居址三次发掘的内容及结论,对居址年代进行判断,对房屋类型、防御墙的建造过程、西北部遗存的性质、墓葬形式、各类遗物分类进行了研究,并与达尔维尔津居址进行对比^[11];1985年,Б. X.玛特巴巴耶夫的副博士论文《费尔干纳楚斯特文化的本地类型》尝试划分出楚斯特文化的北部(楚斯特)类型和东部(达尔维尔津)类型^[12]。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0年至今,除了零星发现新遗址,重要遗址的重新发掘也为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2003、2004年,Б. X.玛特巴巴耶夫、Б. M.阿卜都拉耶夫对达尔维尔津遗址、阿什卡尔特佩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前者的重新发掘,对防御墙的建造过程及城堡的研究有重大推进^[13]。2018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日本联合考古队在达尔维尔津居址进行小规模发掘,旨在获取一批测年样品及物质遗存,以进一步研究其年代及物质文化内涵,成果未发表。1997年,Ю. 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的《奥什居址:青铜时代晚期费尔干纳的历史》基于奥什居址材料及新的测年数据,再次讨论了楚斯特文化在中亚青铜时代晚期文化中的位置^[14]。还有基于具体遗迹和材料进行的研究,如Б. M.阿卜都拉耶夫对楚斯特文化遗址防御工事的专门研究^[15],Б. Д.鲁赞诺夫从冶金的角度对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及分期进行的研究^[16],Б. X.玛特巴巴耶夫对楚斯特文化的居址^[17],及彩陶进行对比研究^[18]。部分学者基于楚斯特文化的材料,对费尔干纳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新的讨论,如Г. П.伊万诺夫对楚斯特文化与埃拉坦文化、舒拉巴沙特文化关系进行重新审视^[19];2020年,А. А.阿洛呼诺夫的博士论文《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费尔干纳盆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问题)》,认为楚斯特文化的来源与中亚南部萨拉子模文化有诸多联系^[20]。

二、遗存概况

目前，发现的楚斯特文化遗址超过 80 处，主要位于盆地北部和东部，其中东部更为集中。遗址成组分布，集中在加瓦 - 卡桑绿洲、安集延绿洲、奥什绿洲、乌兹根绿洲及周边，遗址之间往往相距 20 ~ 30 千米。遗址分布的景观包括草原、半荒漠和荒漠地带。达尔维尔津、楚斯特和奥什居址经过系统发掘，其他遗址部分经调查和清理发掘，大多无法区分文化层，器物多为地表采集。

(一) 重要遗址

1. 达尔维尔津居址

达尔维尔津古城位于安集延州阿伊姆村以东 2 千米处，占地面积约 25 公顷，修建于扁平的土丘上，呈梯形。自 1956 年起，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在此持续发掘了 16 个季度，发掘区主要位于遗址中部和东部防御墙，开设了 7 个发掘区。发掘基本确定遗址由三个区域构成：D- I、D- II、D- III，每个区域分别由一道防御墙包围，根据功能分为居住区、畜牧区和城堡，面积分别为 18、5、2 公顷（图 1）。遗址划分出三个建筑层位，在每个层位都发现了大量窖穴和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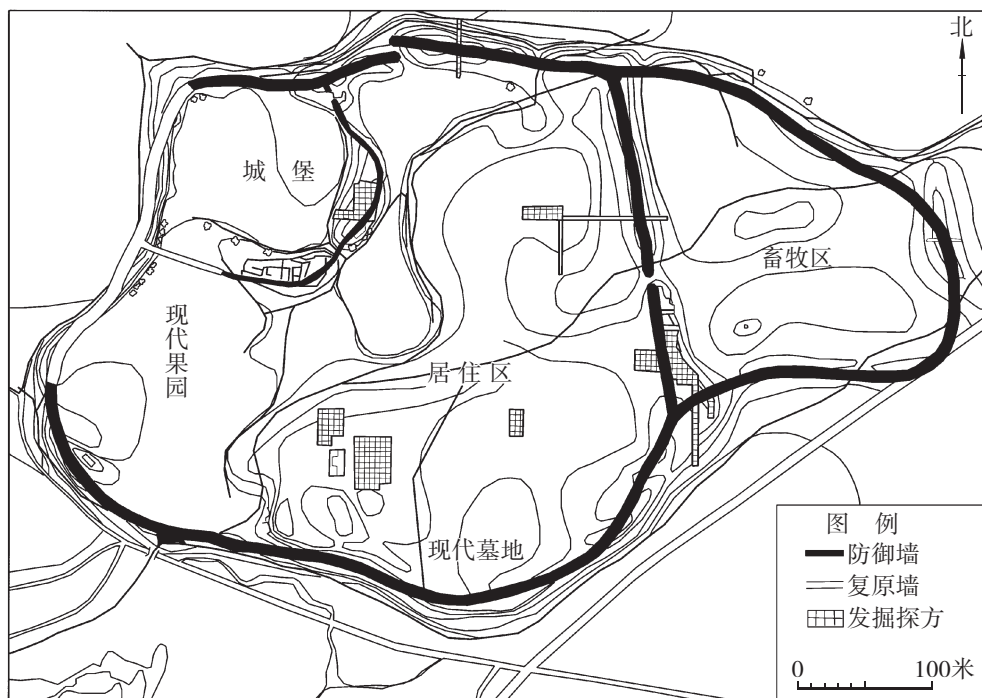


图 1 达尔维尔津居址平面图

[采自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приложение, рис.2]

坑，其中大量用于存储粮食的窖穴是楚斯特文化的重要特征（图2）。小的窖穴直径0.5~1.2米，大的窖穴直径可达1.8~2.3米。

房屋遗迹包括三种类型。Ⅰ类，棚架式房屋，有立柱结构。这种房屋样式根据建筑边缘排列整齐的柱洞确定。Ⅱ类，夯土-地面建筑，用长方形土坯建造。这类房屋有单间房构成的，也有由三至四间房构成的，总面积达140平方米。Ⅲ类，地穴式房屋。根据功能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的房屋，地穴四角有立柱，中间有采光-通风孔，面积为40~80平方米，或平面呈圆形的地穴，面积为10~12平方米；另一类是具有生活日用-生产功能的房屋。

防御工事方面，根据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的研究，达尔维尔津的防御墙使用了不同材料修建：夯土、古瓦里亚^[21]、土坯和帕赫沙^[22]。墙体建造在夯土台基上，用成排的土坯铺砌。往往先在两侧各修建一道砌面，中间填充土、黏土、土坯残片和古瓦里亚，形成墙体（图3）。防御墙除西面被毁，其他部分都被发现了。防御墙厚4~6米，残高2.5米，在东墙中部发现了古城的入口。

对应居址遗迹划分出的三个建筑层位和防御墙的修建过程，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划分出达尔维尔津居址的三个时期。

Ⅰ期为开放式居址、没有防御墙的时期，对应最下层文化层，厚50~80厘米。

Ⅱ期为防御墙建造、使用和改建的时期，对应主要文化层，厚2.5米。

Ⅲ期为防御墙毁弃的时期，居址生活终止^[23]。

同时指出，虽然能观察到遗址上层的彩陶质量比中、下层有所下降，且上层出土了较多厚壁陶器，但总的来说，不同层位出土遗物呈现的物质文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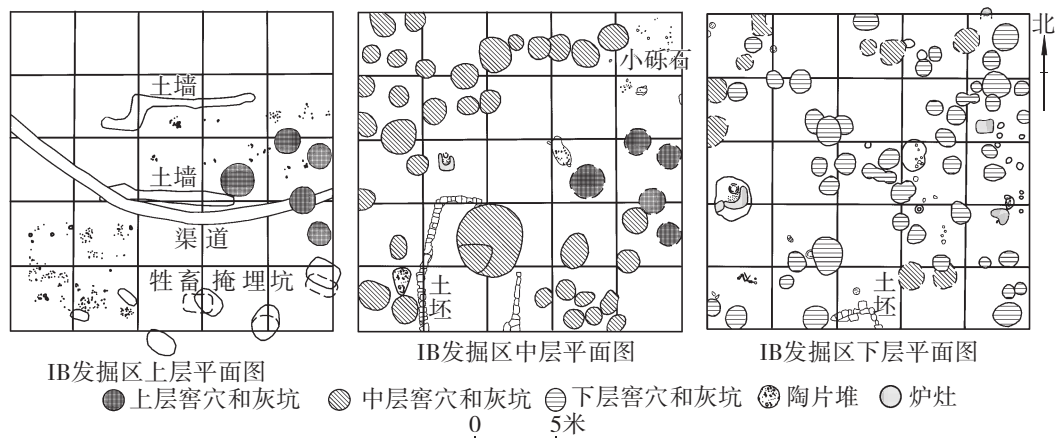


图2 I区（居住区）窖穴和灰坑分层位置图
 （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табл. III, IV,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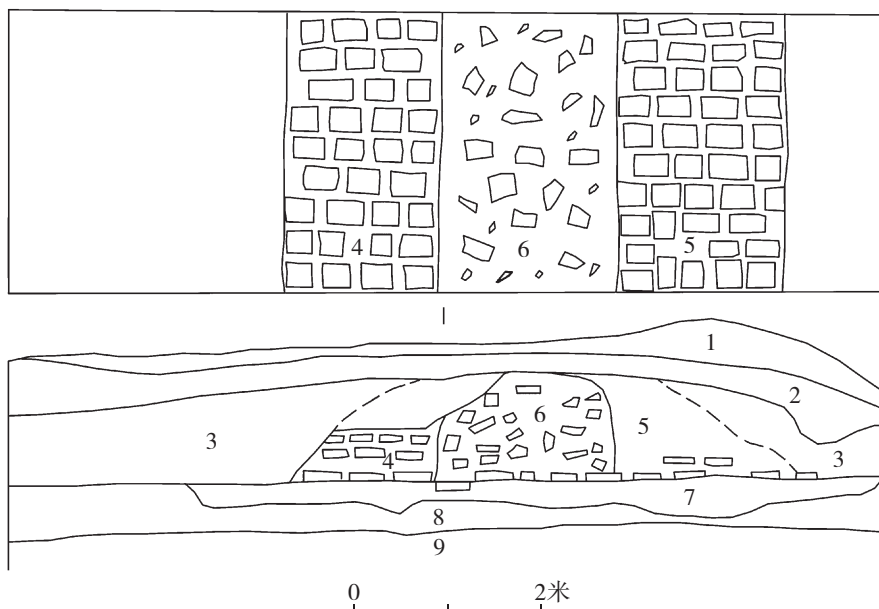


图3 防御墙结构图

1.表土层 2.第三建筑层 3.墙外侧堆积 4、5.土坯墙 6.含土坯和古瓦里亚的填土 7.第二建筑层 8.第一建筑层 9.生土层 [采自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Пардаев М. Х., 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Новое об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ых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ища Дальверзин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сб.: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А. Анарбаев, Ташк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н»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2005, С.61, рис.2]

差异不大。

2003、2004年的发掘表明防御墙经过多次维修、更新（图4）。根据发掘结果，Б. М. 阿卜都拉耶夫认为达尔维尔津居址的防御工事建造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经历了一段没有防御工事的时期后，在城堡区修建了防御墙；第二阶段，城堡和居住区分离，首先修建了外墙；第三阶段，修建了畜牧区的围栏^[24]。

2. 楚斯特居址

楚斯特居址位于盆地北部，纳曼干州楚斯特市北缘，地处加瓦河的沼泽低地。居址面积为4公顷，文化层厚度超过3米。居址除了西北面，其他方向上都有自然的峡谷和沼泽环绕。楚斯特居址由两部分构成：西北部的防御工事和东部的居住区，面积分别为1.5和2.5公顷（图5）。

所有的房屋遗迹都发现于居住区，与达尔维尔津居址的三种类型即棚架式、夯土-地面式和地穴式房屋一致，但每一类型在具体形制、大小和功能上有所区别。例如楚斯特居址的地穴平面呈椭圆形，没有立柱；达尔维尔津居址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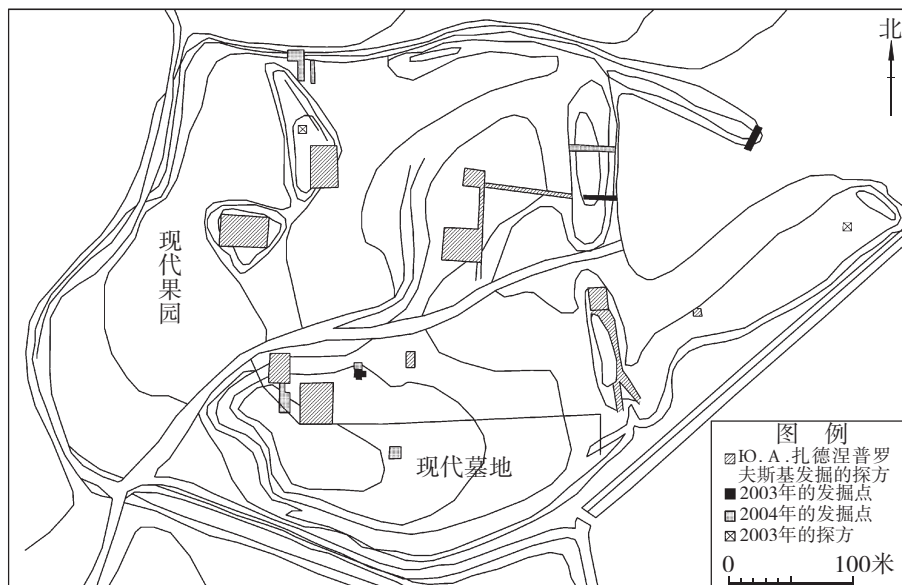


图4 达尔维尔津居址 2003 ~ 2004 年发掘情况

[采自Магбабаев Б. X., Пардаев М. X., Абдуллаев Б. M., “Новое об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ых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ища Дальверзин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60, ри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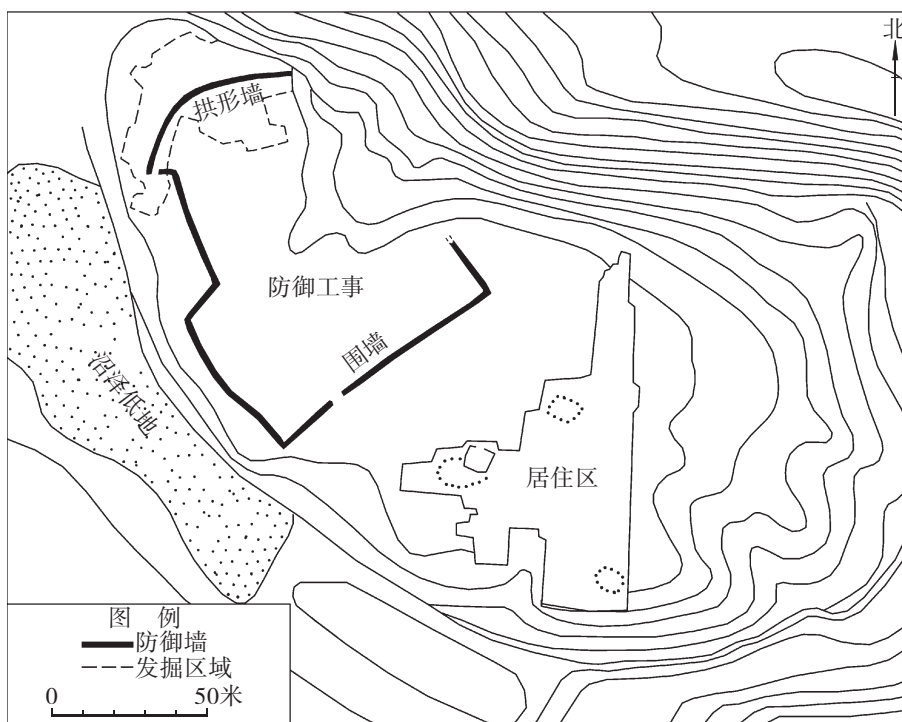


图5 楚斯特居址平面图

[采自Абдуллаев Б. M.,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приложение, рис.14]

穴多呈长方形，墙体用土坯堆砌。

防御工事方面，防御墙由两部分构成：拱形的墙和旁侧不同时期的附属建筑，以及增建的外凸围墙（图6）。墙的西北部没有保存下来。在东南部发现了宽1.2~1.3米的通道。残存墙的总长度为286米。根据墙体不同区域的结构差异，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认为防御墙分三次建成。最早建造了北部拱形墙，厚3米，高4米。墙基用帕赫沙和土坯修建，墙体用土坯建造。靠着墙外侧修建了一个平台，残留圆形马面式建筑，直径10~11米。下一阶段建造了南墙，高达5米，墙体厚2~3米。墙基也用帕赫沙和土坯修建。最后在拱形墙南侧进行增修，并且修建了其他部分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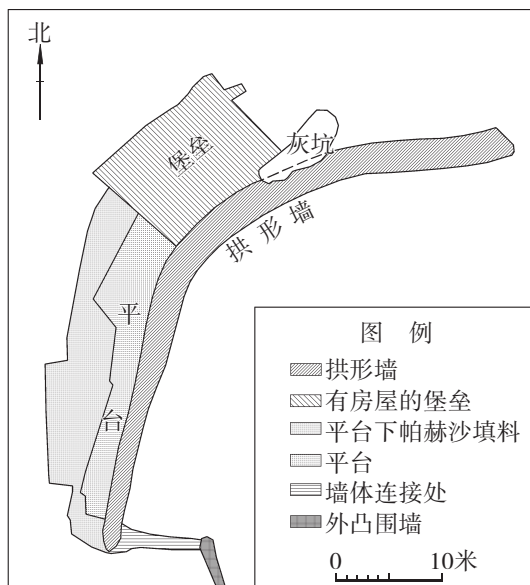


图6 楚斯特居址防御墙平面图

[采自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приложение, рис.15]

如此，楚斯特和达尔维尔津居址均出现于居址的第二阶段。楚斯特居址防御工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墙体外侧的平台，属于相对复杂的防御墙结构。尽管未对这一区域的中部进行发掘，但发掘者认为这部分与达尔维尔津的城堡最为接近，土坯的尺寸也相近，表明楚斯特居址西北部可能是作为城堡使用，也可能是危险时期的畜栏和避难所^[25]。

根据1982~1983年的发掘结果，B. X. 玛特巴巴耶夫初步划分了三个建筑层位，对应居址的三个时期，其中I为生土层上的地层，II为地穴的地层，III为覆盖地穴的地层（最上层）。最下层陶器的表现手法和技术特征与上层不同。他同时指出，目前很难通过物质遗存对II-III期进行区分^[26]。

3. 奥什居址

奥什居址^[27]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地处苏莱曼-图（Сулайман-Тоо）的南坡上部，位于海拔1000米的山地，呈阶梯式格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居址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古代居民在山坡上开凿出阶地，挖出深浅不一的半地穴，以及大量灰坑、窖穴（图7）。遗址延伸超过200米，文化层厚度达1米。地穴式房屋依山形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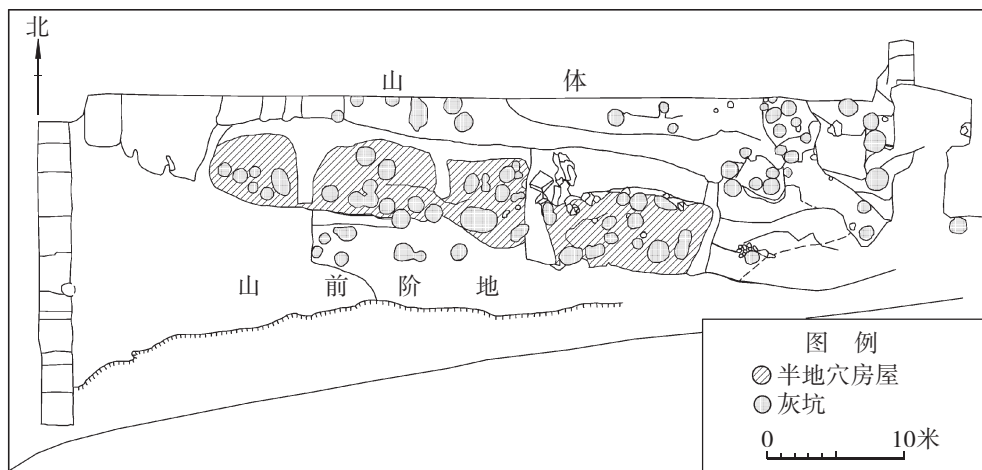


图7 奥什居址1979~1980年发掘平面图
(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рис.24)

造，呈椭圆形，分为居住和日用生产两种功能。第一种地穴建有炉灶，且在地穴内侧边缘和中央的炉灶四周都有柱洞，面积为40~80平方米（图8）。日用生产功能的房屋，明显区别于第一组，没有炉灶和柱洞系统。这些房屋内有较大的用于储存粮食的窖穴，且往往紧挨着居住的房屋，可能是用于长期储存谷物和其他用品，以及在暖和的季节工作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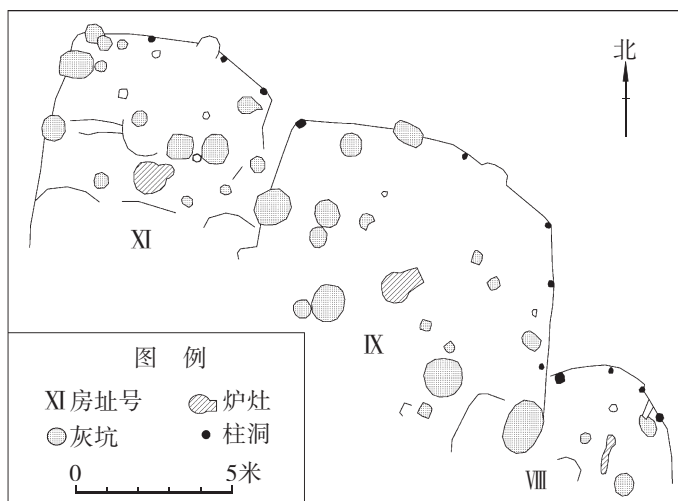


图8 奥什居址Ⅷ、Ⅸ、Ⅺ号地穴平面图
(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рис.32)

(二) 遗物

1. 陶器

根据器表特征，楚斯特文化的陶器可分为五类：施红陶衣、施彩绘、厚壁施白陶衣、灰陶（炊器）、厚壁陶器。

(1) 施红陶衣 陶质粗糙，夹砂，烧制火候不匀，陶片截面颜色不一。器

表施红陶衣。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泥条盘筑法，在陶器上有明显的条带黏土的形状；另一种是用织物包裹的模具制作，在器物内侧会留下织物印痕。器形丰富，以折肩盆、卵形罐、锥形罐、半球形杯为代表（图9）。

（2）施彩绘 彩陶是楚斯特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其陶质及制作方法与第一类陶器一致，但彩陶质量更高，陶衣更加鲜亮，部分磨光。器形也与第一类陶器一致。一般在器物上部绘黑彩，器身普遍施彩的情况较少。纹饰以几



图9 楚斯特文化陶器的主要器形

1、2.球形釜 3、4.高领罐 5~7、12.锥形罐 8.小高领罐 9、10.折肩盆 11.盆 13.卵形罐 14、16.小罐 15.盘 17.器盖（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табл. XIII）

何纹为主：三角形、楔形三角、菱形、带状、个别的线纹。部分陶器口沿内侧绘线纹和三角纹（图 10）。

（3）厚壁施白陶衣 器形包括小罐、直壁平底罐、杯等。

（4）灰陶（炊器） 使用泥条盘筑法，也用织物包裹的模具制作，陶土中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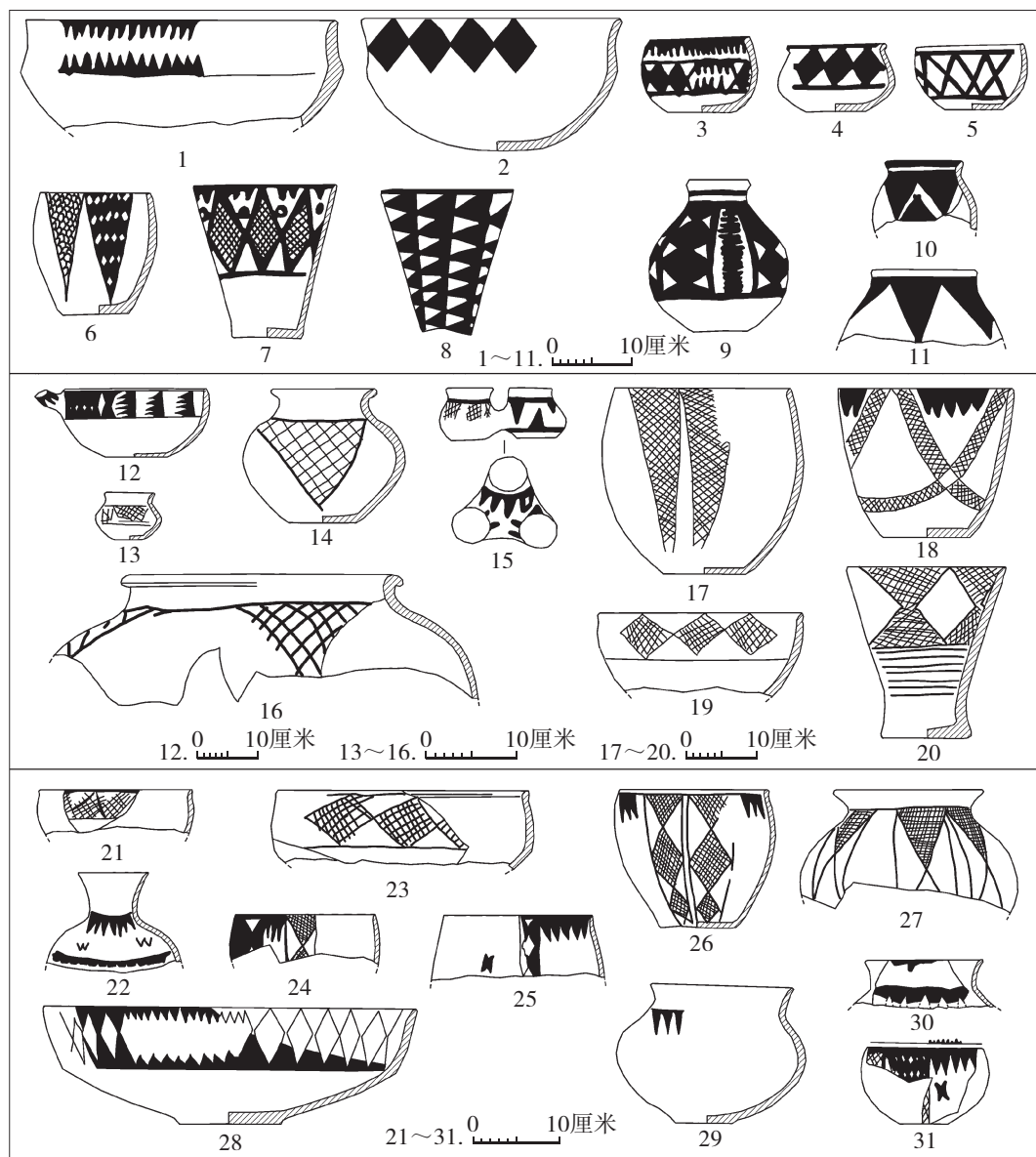


图 10 彩陶纹饰

1~11.达尔维尔津居址出土彩陶 12~20.楚斯特居址出土彩陶 21~31.奥什居址出土彩陶（采自Матбабаев Б.Х.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расписной керамики чувст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50-52, табл.V-VII）

石灰岩。器形有侈口球形釜、各式罐、火盆。

(5) 厚壁陶器 陶土中掺烧土，器形有大瓮和缸，可能用于储存粮食。

有个别带耳器和带管流器，器耳有系耳、平鬲、小环耳、上翘的鬲、圆钮器耳。有碟形器盖，部分在中间有凸出的钮。还有锥形和扁豆状的陶纺轮、陶坠、炉灶支架。

此外，在达尔维尔津居址和奥什居址还发现了少量黑灰磨光陶器，在盆地东部的奇姆巴伊和霍扎穆巴格居址中也零星发现过这类陶器。

2. 铜器

工具占多数，武器和装饰品数量较少，有刀、马衔、镞、镰、鱼钩、矛、锥、针、凿、环、串珠等（图 11）。圆柄铜刀是楚斯特文化典型的工具，刀身和柄部为一体，柄端为圆形。E. E. 库兹米娜最早根据器形将楚斯特文化的铜器划分为三组：一是南边来源的器形，带柄双叶矛、带柄铜镜，与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地区文化有联系；二是草原因素的器形，单刃片状刀、带柄刀、刃部带镂孔的矛、楔形凿、马镞和马衔、凸面饰片、环首棒；三是楚斯特文化独有的器形，单刃圆柄刀、带叶片的装饰、一类带柄矛、截面呈长方形的单面锥^[28]。

在居址还发现了浇铸带柄铜镜、马镞、装饰品等的铸范（图 12），及铜铸锭、铜渣，它们表明遗址中存在青铜浇铸活动。

另外，在达尔维尔津居址发现了一件铁刀残片，外套木刀鞘。在居址中也发现了铁矿残渣，以及一件器皿表面的一小块铁，证明遗址中存在铁器。

达尔维尔津居址的铜器类型比楚斯特居址的丰富，在合金成分上也有差异。在达尔维尔津居址占主导地位的是纯的红铜（46.8%），其次是锡青铜（29.6%）和复杂的锡-锑-砷合金，共发现了 6 种合金。在楚斯特居址占主导地位的是锡青铜（44%），纯的红铜（30%）和锡-铅青铜（12.7%）次之，共发现了 8 种合金^[29]。

3. 石器

在居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石器，分为五类，其中以农业工具和家庭生产工具占多数（图 13）。农业工具包括锄、磨盘、磨具、研钵、杵。镰是该文化最典型的石器，在达尔维尔津居址发现了 480 件。长 9~20 厘米，刀身宽 5~10 厘米，厚 5~10 毫米。与冶金生产相关的工具包括石锤、石范、磨石、砧台。渔猎工具主要是网坠，一种是两侧有凹槽，一种是中间穿孔。家庭生产工具包括加工石器、纺织、加工皮革制品、磨光、加工木器的工具。武器主要是子弹



图 11 达尔维尔津居址出土铜器

1.刃部带镂孔的矛 2.双叶矛 3、5、10~12.锥 4.环首棒 6、8.圆柄刀
7.镰 9、14.镞 13.楔形凿 (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табл. XXI, XXII)

形石器，可能是投掷器。

4. 骨、角器

骨器包括三孔马镫、锥、针、松土的工具、管、纺轮、梳等。在楚斯特居址发现角器较多，有 13 件马镫，还有一些箭镞，都与北边草原部落使用的器形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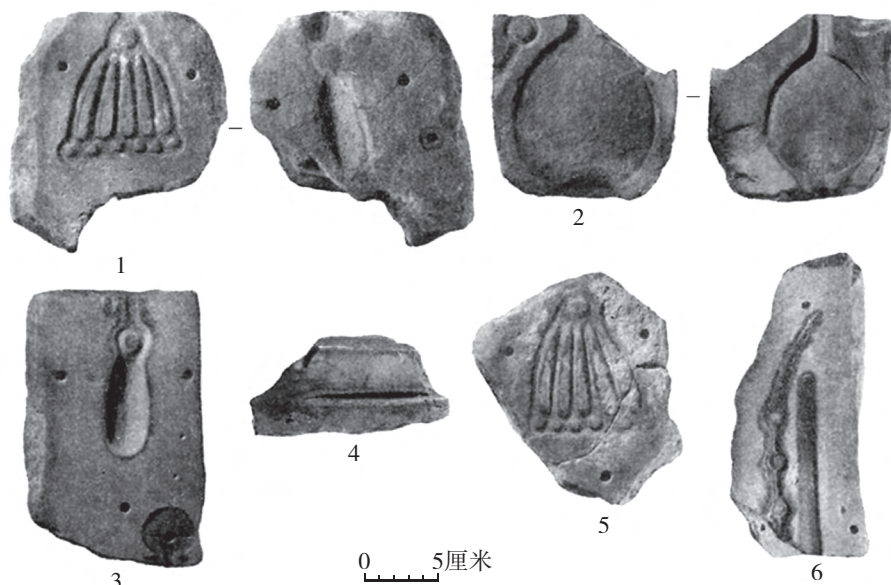


图 12 达尔维尔津居址出土石范

1.正面：装饰品范；背面：不明器物范 2.镜范 3、4.不明器物范 5.装饰品范 6.马镫范（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табл. XX）

5. 动物骨骼

在居址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几乎都是厨余。发现的动物骨骼分为家养和野生两类。家养动物占多数，包括母牛、山羊、绵羊、马、驴、狗、骆驼，可能还有猪。在两处居址发现的马骨都是厨余，表明马在楚斯特文化中作为食物。同时，根据居址中发现的马镫、马衔，及铸造铜马镫的石范判断，马在当时也用于骑行，也可能作为畜力。

野生动物相对较少，表明狩猎在楚斯特文化居民生活中扮演次要角色。其种类有羚羊、盘羊、野驴、鹅喉羚、野猪、鸟等。

（三）墓葬

目前没有发现楚斯特文化独立的墓地，在达尔维尔津和楚斯特居址中都发现了在居址范围内埋葬人骨的情况。在居址的各个层位都发现了人骨，包括三类情况。一是单人葬，往往没有随葬品，只有个别墓葬随葬了一件陶器。二是集体葬，埋葬多达 7~8 具人骨。在居址东南部还发现了一处埋葬了 7 具人骨的墓葬。三是二次葬，还发现了单独埋葬头骨堆的情况。楚斯特文化墓葬多为屈肢葬，达尔维尔津居址出土人骨多头朝东北和东南，楚斯特居址出土人骨则多头朝西南。发现的部分头骨有钻孔^[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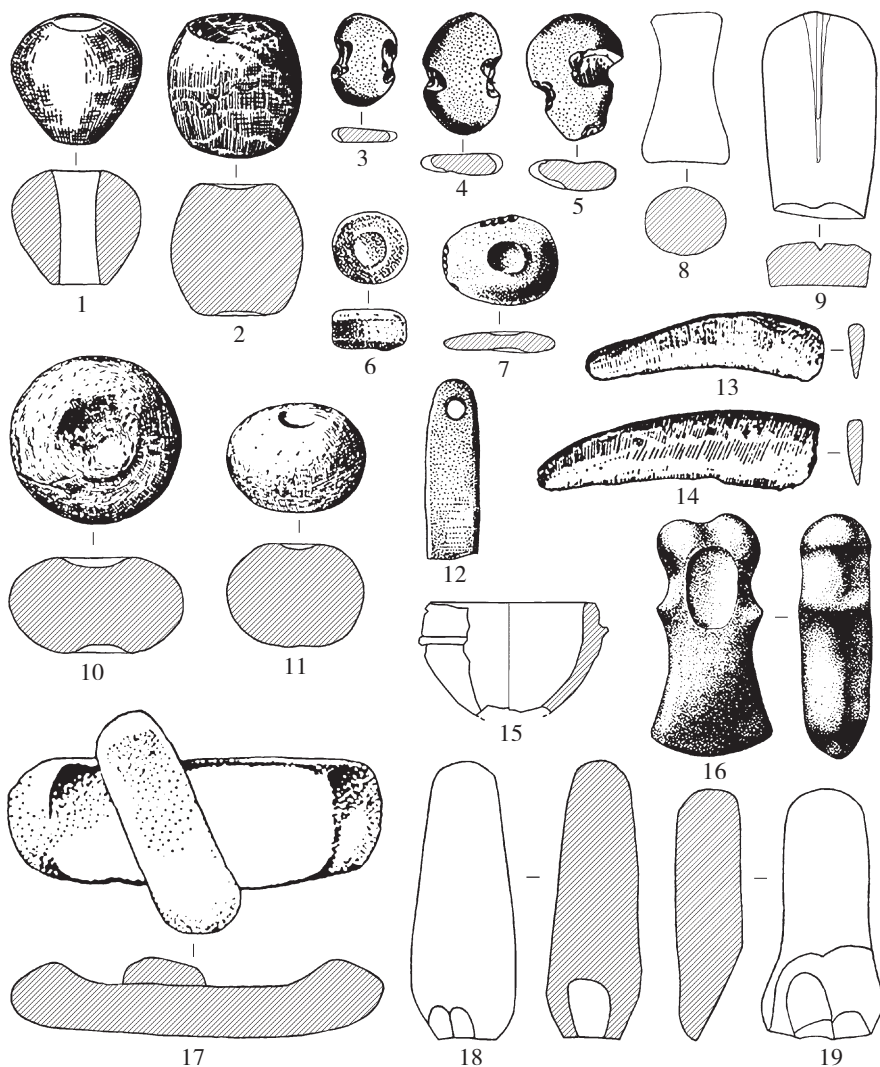


图 13 楚斯特文化石器

1.杖头 2、6、7.磨具 3~5.网坠 9、12.砺石 8.磨光器 10、11.轴承 13、14.镰 15.钵 16.铸形器 17.磨盘和锉刀 18.锤 19.锄 (采自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табл. XXVI-XXX;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Ширинов Т., “Каменные издел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хозяйстве древних обитателей Дальверзинтепа”, рис.1, 2)

综上所述，楚斯特文化内涵十分复杂，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有大型农业居址，房屋形制多样，以大量储藏粮食的窖穴为突出特征，部分建筑遗迹具有仪式性功能。出现了原始的防御工事，包括防御墙和城堡，显示出初始的城市化特征及社会分化。彩陶是该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占陶器总量1%~10%，器形丰富，以卵形器、锥形器、折肩器为突出特征。红地上绘黑彩，以几何纹

为主。该文化具有发达的铜器加工业，金属器数量多，形制来源丰富，与周边地区有广泛联系。居民生产、生活中大量使用石器，农业工具占很大比重，镰是最典型的石器。从陶器内侧的纺织品印痕及发现的纺轮来看，他们有较成熟的纺织业。总的来看，楚斯特文化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种植大麦、小麦和黍，辅以一定的家畜饲养，及少量的渔猎、狩猎，各项手工业如制陶、石器加工、铜器加工、纺织、皮革加工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外，该文化居民具有特殊的葬俗，在居址区域内埋葬人骨，它可能延续了西亚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老葬俗。

三、相关研究

（一）年代判断

对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判定，主要通过相似遗存比较、借助¹⁴C测年技术、金属器成分分析三种方法。

1. 对比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发掘楚斯特文化居址以来，学者普遍将该文化年代定在公元前2千年末至前1千年初^[31]。文化的下限往往以埃拉坦文化（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开始为准，对上限的研究则往往转向与中亚相似的文化遗存的比较，认为楚斯特文化和科佩特塔格北麓的安诺IV b期、穆尔加布绿洲的雅孜I期、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库楚克特佩、阿富汗北部的蒂利亚特佩为同时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2千年末至前1千年初，确切为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32]。

2. ¹⁴C测年方法

《费尔干纳的古代农业文化》一书首次给出了达尔维尔津遗址的¹⁴C测年数据：距今 2720 ± 120 年和 3050 ± 120 年，即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距今 3050 ± 120 年这一测年数据在1992年F.科尔的书中使用年轮校正的方法，校正为公元前1605年至前938年^[33]。1997年，《奥什居址：青铜时代晚期费尔干纳的历史》一书给出了楚斯特遗址、达尔维尔津遗址、奥什遗址共10个测年样品^[34]，排除较早的年代数据，较可信的年代范围集中在公元前15世纪至前8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各绿洲彩陶文化都有了一些新的测年数据（表1），集中在公元前15世纪至前9世纪，与上述楚斯特文化的测年数据较吻合。

3. 金属器成分分析

B. Д. 鲁赞诺夫将楚斯特文化铜器的形制和化学成分与中亚地区其他文化

的铜器进行了比较研究。达尔维尔津居址和楚斯特居址的铜器在形制上很接近，但化学成分差异较大，他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体现了年代上的差异。基于此，他将楚斯特文化划分为两个阶段。

表 1 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各绿洲彩陶遗存年代

遗址	样品	实验室编号	年代 (BP)	校正年代 (BC)	发表年代(BC)	出处
雅孜特佩	木炭	Beta-33566	3120 ± 90	1608 ~ 1129	1512 ~ 1309	Hiebert 1993 ^[35]
库楚克特佩	木炭	LE773	2850 ± 60	1251 ~ 848	1120 ~ 890	Kohl 1992 ^[36]
玛伊达特佩	木炭	Pr.BX-1	3017 ± 25	1386 ~ 1133		Görsdorf 2007 ^[37]
	木炭	Pr.BX-2	3071 ± 31	1415 ~ 1265		
	木炭	Pr.BX-16	2964 ± 22	1292 ~ 1116		
	木炭	Pr.BX-17	3032 ± 39	1409 ~ 1132		
桑吉尔特佩	木炭	Gif-12277	2985 ± 30	1371 ~ 1122	1369 ~ 1121	Lhuillier 2013 ^[38]
科克特佩	木炭	Beta-259548	2610 ± 40	894 ~ 592	820 ~ 760	Lhuillier 2013 ^[39]
	木炭	Beta-259549	2590 ± 40	831 ~ 552	810 ~ 670	
	木炭	Beta-259550	2860 ± 40	1191 ~ 914	1010 ~ 980	
	木炭	Gif-12273	3025 ± 30	1396 ~ 1135	1193 ~ 1140	
	木炭	Gif-12274	3030 ± 30	1393 ~ 1133	1395 ~ 1138	
	木炭	Gif-12275	2650 ± 35	896 ~ 787	894 ~ 786	
	木炭	Gif-12276	2950 ± 35	1295 ~ 1046	1292 ~ 1046	
库匀	木炭	BA182333	2840 ± 25	1058 ~ 918		林铃梅 2020 ^[40]
	木炭	BA182334	2820 ± 25	1042 ~ 910		
	木炭	BA182335	3020 ± 25	1311 ~ 1194		

早期（达尔维尔津）阶段，在公元前 14 世纪中期至前 9 世纪末、前 8 世纪。这一时期的冶金生产基于费尔干纳 - 塔什干的矿源，使用草原部落冶金中心输入的原料和成品，生产显示出与中亚东南部定居农业部落相似的冶金传统，费尔干纳 - 塔什干来源的金属在泽拉夫善河中上游有较广泛传播等。

晚期（楚斯特）阶段，在公元前 9 世纪末至前 8 世纪上半叶、前 7 世纪。这一时期的矿源发生改变，其中一处为费尔干纳 - 塔什干地区的草原部落利用；锡青铜占主导地位；产品种类发生大的变化，冶金加工生产衰落；与费尔干纳盆地的草原部落（凯拉克 - 库姆文化）的冶金建立密切联系，并保存了与南边

库楚克文化铸工的紧密联系；向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输出原料和产品。

B. Д. 鲁赞诺夫曾指出这一分期的问题：首先，铜器的研究结果缺乏地层证据支持；其次，这一研究仅仅基于楚斯特和达尔维尔津两处居址的铜器，材料量仍不足以说明整个文化的情况^[41]。

近来，Ю. Г. 库吉莫夫等将楚斯特文化的草原类型铜器与北边草原的相似遗存作对比，认为楚斯特文化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13 世纪，下限不晚于公元前 8 世纪^[42]。他们的研究也同样存在 B. Д. 鲁赞诺夫指出的局限性。

（二）楚斯特文化的来源及其在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彩陶文化圈中的位置

1. 楚斯特文化的来源

除了楚斯特文化，在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各绿洲都发现了以手制彩陶为特征的遗存。从各类文化特征判断，这些彩陶类遗存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由于楚斯特位于这一文化圈的东北缘，地处中亚南部绿洲与北部草原、中国新疆地区的接触地带，它的来源问题自然成为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彩陶文化圈来源问题的焦点。关于楚斯特文化的来源，国内外学者大致持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彩陶文化从新疆向中亚传播，新疆彩陶来源于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向西影响到了费尔干纳等地。梅建军认为新疆四道沟下层文化、新塔拉文化的西渐，是公元前 2 千纪末中亚手制彩陶兴起的原因之一^[43]。韩建业提出起源于陕甘地区的彩陶文化，经历了四波向西扩散的过程，推测新疆察吾呼沟口文化曾对楚斯特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44]。郭物引 H. P. 法兰克福的假设，认为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手制彩陶可能来源于新疆，但他也意识到新疆和中亚的彩陶文化缺乏考古学文化的中间环节^[45]。E. E. 库兹米娜提出中亚有两个彩陶文化来源中心：一个在阿富汗南部（蒙迪加克 V 期），另一个在中亚北部，一部分在费尔干纳盆地，一部分在新疆^[46]。

第二种观点是楚斯特文化来源于中亚南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B. И. 斯普利舍夫斯基^[47]和 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48]都将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和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彩陶联系在一起。А. И. 伊萨科夫认为萨拉子模承接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早期彩陶文化，青铜时代晚期传播至费尔干纳、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里亚北部^[49]。

第三种观点为转化理论，认为楚斯特文化是本地畜牧人群向定居农业生活方式转变而形成的。А. 阿斯卡洛夫认为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手制彩陶文化最早起源于费尔干纳地区，继而向中亚南部扩散，影响到北巴克特里亚地区。他指出楚斯特文化不可能是一种非常完备的形态从别处迁徙而来的，相反，费尔

干纳盆地存在大量深厚的地下水储备、肥沃的黑土、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古代农业文化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一部分土著居民逐渐过渡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楚斯特文化^[50]。Φ. A. 马克苏多夫从古环境气候、植被、地貌水文条件、考古发现等方面论证费尔干纳盆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具备从狩猎采集自主转变至农业生产的条件^[5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发现的个别遗存，如哈克窖藏和阿弗拉屯窖藏，以及石秤砣，都透露着早期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交换的痕迹。近年在盆地东南部沙根姆墓葬发现的遗物与泽拉夫善河上游的萨拉子模文化有着明显联系，这一发现表明泽拉夫善河流域和巴克特里亚北部的早期农业向费尔干纳盆地传播^[52]，为研究费尔干纳盆地早期农业的出现提供了新线索，或可为“本土发展理论”^[53]提供支撑。但这些遗存与楚斯特文化之间仍有缺环，无法解释楚斯特文化的直接来源。

2. 楚斯特文化在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彩陶文化圈中的位置

如上文所述，楚斯特文化处在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彩陶文化圈与周边文化的接触地带，它具有独特的位置。它与同时期塔什干绿洲的布尔古留克文化、粟特的科克特佩 I 期遗存、北巴克特里亚的库楚克 I 期遗存、南巴克特里亚的蒂利亚 I 期遗存、马尔吉亚纳的雅孜 I 期遗存、科佩特塔格北麓的乌鲁格特佩遗存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如手制陶器占多数，部分使用纺织品包裹的模子制作，有少量或无轮制陶器；器形以圜底器为主，包括圜底钵和圜底鼓腹罐，束颈鼓腹罐、杯（碗）、浅腹盘、带钮器盖、碟、缸形器比较常见，多无耳器；彩陶占陶器总量 1% ~ 10%，在红陶衣上绘黑彩、浅色陶衣上绘红褐彩和黑褐彩；彩绘纹饰以各式三角纹组合为主，填充网格纹、斜纹或实心彩；使用镰、马鞍形磨盘、磨具、杵、研钵、权杖、纺轮等石质工具；使用镰、箭镞、锥、刀等铜质工具、武器；居住在半地穴房屋或地面建筑中；地表有大量用于储藏粮食的窖穴。

它也有不少独特性：陶器器形多样、彩绘纹饰丰富，石器数量多，铜器发达。楚斯特文化几乎不见轮制陶器，许多陶器器形如卵形罐、锥形罐、折肩盆和高领折肩罐等都不见于中亚其他绿洲文化。丰富的石器如镰刀、马鞍形磨盘、权杖头等显示出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密切联系。同时期中亚南部地区遗存中金属器数量非常少，相比之下，楚斯特文化则发展出较高的铜器加工技术，显然受到了盆地内及周边畜牧部落的影响。半地穴式房屋也不见于中亚南部此前的农业遗存，却是草原畜牧部落典型的房屋样式。

（三）楚斯特文化和新疆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楚斯特文化的来源问题也引申出了其与新疆地区文化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彩陶类遗存中的部分因素，如陶器、石镰刀、石权杖头、石磨盘等因素受到来自新疆的影响。二是多数苏联学者都认为楚斯特文化和新疆的彩陶文化属于同一文化圈，来源于中亚西南部科佩特塔格山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54]。关于新疆彩陶和甘青地区的关系，他们不否认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与四坝文化的联系，但将这种联系视为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交会的两支族群文化和两支彩陶传统^[55]。三是以法国学者为代表，他们对新疆和甘青地区的遗存有更深入了解，主张中亚彩陶和新疆彩陶有各自独立的来源^[56]。

国内学者如陈戈很早就注意到楚斯特文化与新疆地区文化存在一定联系^[57]，近年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如梅建军^[58]、郭物^[59]、水涛^[60]、吕恩国和魏久志^[61]等，讨论集中在新疆四道沟下层文化、新塔拉文化和阿克塔拉文化与楚斯特文化存在诸多相似的因素。其中，水涛认为费尔干纳盆地的素面灰黑陶类遗存曾向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传播。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也专门将新塔拉遗址和楚斯特文化遗存进行了对比研究，包括都发现了刻交叉纹标记的土坯、文化层厚度相近、居址中都有窖坑、以手制陶器为主、彩陶为红地黑彩、纹饰有相似的齿状纹和斜线三角纹、大量相似的石器、绝对年代相近。但他仍将新疆天山南麓至新塔拉遗址一带纳入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手制彩陶文化圈，并提出设想，费尔干纳盆地位于这一文化圈的中央，它东距新塔拉遗址约1000千米，西南与马尔吉亚纳的雅孜特佩距离也与此接近^[62]。

另外，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指出，楚斯特文化的典型器物石镰来源于新疆，应该考虑到石镰这种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随着粟、黍一类农作物自东向西从新疆传播至中亚^[63]。这与公元前2千纪中叶黍开始传入中亚绿洲的推测也吻合^[64]。楚斯特文化除发现了大量大麦和小麦种子，也发现了黍类的种子^[65]。这种旱作农业的传播可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畜牧人群转变为定居农业人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楚斯特文化遗址在费尔干纳盆地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位置

目前费尔干纳盆地的早期城市化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楚斯特文化。Ю. А.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最早提出，达尔维尔津居址具备了城市的基本考古标准^[66]。首先，它拥有巨大的面积——25公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并且，居址具有复杂的结构，包括三个区域。其次，各区域都有防御墙包围。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独立的城堡，它应该被视为城市类居址最重要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分层的证据^[67]。最后，达尔维尔津居址有发达的手工业，包括制陶、纺织、冶金、石器和骨器加工、首饰制作等。综上，达尔维尔津居址具有城市形制。达尔维尔津居址扮演着这一时期费尔干纳盆地政治、手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的角色。

这一时期其他大型遗址——阿什卡尔特佩（面积为13公顷）、捷赫干特佩（面积为5公顷）、霍扎穆巴格（面积为4公顷）和楚斯特（面积为4公顷），则是所在农业绿洲的中心。楚斯特居址具有防御墙和城堡，被认为是原始城市^[68]。

防御工事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指标。B. M. 阿卜都拉耶夫将费尔干纳盆地防御工事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时期（公元前12世纪至前4世纪）、古典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中世纪（公元5~13世纪）。古代时期包括楚斯特文化和埃拉坦文化两个阶段，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达尔维尔津和楚斯特居址最早都是在开放性居址上建造起防御墙，并经过阶段性增修和维护。防御性居址的出现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居民与周边畜牧部落的冲突加剧。

埃拉坦古城使用了与先前楚斯特文化相同的建筑材料古瓦里亚和土坯，并继承了它的建筑技术，都使用双侧砌面的方法，中间填充夯实的建筑废料和次等的建筑材料。同时在防御工事形制上有了新发展。首先，从达尔维尔津居址依地形而建，呈不规则形状，到楚斯特居址的防御墙有了特定明确的界线，再到埃拉坦古城形成规则的长方形，显示出很强的规划性。然后，在楚斯特文化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马面建筑，到这一时期成为防御墙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埃拉坦古城没有城堡，学者推测可能与当时的政治体系改变有关，当时畜牧部落可能扮演了主导角色^[69]。随后，在古代时期的基础上，古典时期费尔干纳盆地防御工事的各项主要元素得到完善，形成强大的防御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楚斯特文化开始形成费尔干纳盆地古代城市的一项重要特征，即保留一片由防御墙包围的广阔放牧区，在危险时期也可作为周边居民避难的场所，包括达尔维尔津居址Ⅱ区、埃拉坦遗址的外城、舒拉巴沙特古城Ⅰ区、明铁佩古城巨大的外城。这种特殊的城市结构，无疑与费尔干纳盆地内深厚的农牧交织的经济、文化传统有关。

（五）楚斯特文化与费尔干纳盆地青铜时代晚期畜牧遗存的关系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费尔干纳盆地，除了生活着楚斯特文化的定居农业人群，还生活着畜牧人群，他们多分布在盆地南缘和西缘的山前地带，发现的遗存包括凯拉克-库姆遗址、乌阿基尔墓地、卡拉姆库尔墓地、依巴吉墓地、切克墓

地、阿尔西夫墓群、卡什卡尔奇墓地、达汉纳墓地、达什提 - 阿什特墓葬等。这些畜牧遗存显示出与青铜时代分布于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密切联系，尤其与七河流域、天山地区的畜牧遗存关系紧密。B. A. 李特文斯基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盆地西南凯拉克 - 库姆遗址的发掘，划分出一支独立的凯拉克 - 库姆文化^[70]。

在陶器方面，一方面，凯拉克 - 库姆文化晚期出现的部分陶器样式，如带管流器、敛口钵、小领陶器，显然受到了楚斯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楚斯特文化的陶器进入了凯拉克 - 库姆文化圈遗存中，在依格纳龟裂地发现了完整的楚斯特文化彩陶罐^[71]。另外，在塔什 - 库尔干、达什提 - 阿什特、霍吉 - 依格纳墓地都发现了楚斯特文化彩陶和草原类型陶器并存的情况^[72]。

在凯拉克 - 库姆遗址发现了大量青铜冶炼及加工的遗迹，反映出冶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该文化具有发达的冶金技术。B. A. 李特文斯基更是指出该文化部落的分布可能和盆地西部的矿源地有着紧密联系^[73]。楚斯特文化与同时期中亚其他农业绿洲相比，具有突出的铜器加工技术，这无疑是在与邻近的凯拉克 - 库姆文化部落的交往中学习所得。E. E. 库兹米娜将凯拉克 - 库姆遗址、乌阿基尔、卡拉姆库尔、达汉纳墓地出土的，以及在盆地偶然发现的铜器划分为两组^[74]：第一组是与楚斯特文化遗址所见类型相似的，叶形带柄矛、截面呈长方形的锥、圆形柄的刀；第二组是管釜斧、鹤嘴镐、铲、有釜铤、单刃刀、有釜矛、饰片、带角的镮、喇叭口鬃环，与七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的器形相近。第一组器形显然表明了楚斯特文化居民与凯拉克 - 库姆文化居民的接触。

可见，青铜时代晚期费尔干纳盆地的农业文化和畜牧文化存在密切的交往与互动，包括生产技术、器用习惯的双向影响和商品交换。

四、展 望

从楚斯特文化的发现至今已经过去 70 余年，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得这支独特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农业文化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但同时，这支文化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呈现出广阔的研究前景。

虽然目前发现了楚斯特文化超过 80 处遗址，但保存状况较好、经过发掘者屈指可数，发掘较系统的楚斯特居址和达尔维尔津居址还远不足以支撑起文化内部的分期。首先，焦点在于楚斯特居址和达尔维尔津居址的关系问题，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年代差异造成的，还是地域差异造成的？并且，楚斯

特居址目前只有零星的测年数据，无法构建出确切的年代上下限，也就难以与达尔维尔津居址进行详细的年代比较。其次，如前所述，楚斯特居址和达尔维尔津居址的分期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这为我们理解楚斯特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增加了困难。在这一情况下，要继续深入对楚斯特文化的研究，除了需要对现有的重要遗址进行重新发掘与研究，还需要有针对性地选取其他遗址进行发掘，获取更多信息。

关于楚斯特文化的来源，上述讨论大多考虑的是单一来源，但目前看来，楚斯特文化的来源复杂，无法用单一来源来解释，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向上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受西亚的影响，最早出现在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哲通文化为代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在中亚南部科佩特塔格北麓山前地带形成了早期农业社会，以纳马兹加特佩为代表。这种早期农业社会的形态持续向东发展，很可能伴随着农业人群的迁徙，使得泽拉夫善河上游出现了萨拉子模文化。到青铜时代，随着科佩特塔格山前平原绿洲衰落，发展的动力中心逐渐转移到东部的穆尔加布三角洲。与此同时，在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发展出了本区域的城市文化中心。青铜时代中、晚期，受中亚南部农业文化的影响，在中亚北部也逐渐出现了定居农业文化，以使用手制彩陶为特征。在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千纪中叶至前1千纪初，欧亚草原的畜牧部落大规模向南进入中亚，在泽拉夫善河下游形成了塔扎巴格亚卜文化，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凯拉克-库姆文化，以及在泽拉夫善河上游等地都发现了安德罗诺沃类型的遗存。从楚斯特文化的各项因素来看，它无疑与盆地内的凯拉克-库姆文化部落及盆地周边的畜牧部落有着密切联系。公元前2千纪中叶，旱作农业经新疆向中亚传播，楚斯特文化出现了以种植黍类作物为特征的农业，并大量使用石镰刀这类工具。综合楚斯特文化的各类要素可知，我们应该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中亚南部文化北传、欧亚草原文化南传、新疆地区文化西传的宏观历史背景中认识楚斯特文化的形成过程。它是不同方向上的文化影响在费尔干纳盆地碰撞、融合的结果，并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面貌。

楚斯特文化的去向问题仍有待研究。以往的研究认为埃拉坦文化承接楚斯特文化而来，主要依据陶器制作技术和彩陶纹饰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未能很好解释的疑点，例如楚斯特文化与埃拉坦文化遗存在地域分布上没有重合，即未发现两个时期文化层叠压的证据。且近年，Г. П. 伊万诺夫指出埃拉坦和楚斯特文化陶器差异很大，对这种继承性提出了质疑。另外，在盆地东部发现了遗

址，表明有楚斯特文化和舒拉巴沙特文化陶器共存的情况，相比于埃拉坦文化，舒拉巴沙特文化更似直接承袭楚斯特文化发展而来，但两者年代上有差距，中间环节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75]。

目前，对楚斯特文化物质遗存的研究包括对金属器的检测分析、人骨分析，但仍有很多有机材料，如植物种子、孢粉、动物骨头等，有待于借助跨学科技术及方法进行研究，以深入揭示楚斯特文化居民生活及环境的各个层面。

注 释

- [1]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МИА, 118,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45-47.
- [2]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МИА, 118,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45-47.
- [3] Спришевский В. И., *Чуст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 истор. наук, Ташкент, 1963.
- [4]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Основные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Чустского поселения в Фергане (1950-1982 гг.)”, *ИМКУ*, вып.19, Ташкент, 1984, С.46-71.
- [5]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Бишкек: Мурас, 1997, С.7, 8.
- [6]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Типология и дина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городских поселений древней Ферганы”, *Древни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АН СССР, Ин-т археологии,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Науч, совет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ред,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Л., 1973, С.17-20.
- [7]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Укрепления чустских поселений и их место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й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СИА*, вып.147, 1976.
- [8]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Ширинов Т., “Каменные издел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хозяйстве древних обитателей Дальверзинтепа”, *ИМКУ*, 1983, вып.18, С.21-37.
- [9] Рузанов В. Д.,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таллообработке у племен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А*, 1980, № 4.
- [10]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и памятники ранне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78.
- [11]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Основные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Чустского поселения в Фергане (1950-1982 гг.)”, *ИМКУ*, вып.19, Ташкент, 1984, С.46-71.
- [12]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Локаль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 Ленинград, 1985.
- [13]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Юлдашев 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Ферганы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городища Далварзин, Ашкалтеп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2004-2005 годы*, Ташкент, 2006, С.143-152.
- [14]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Бишкек: Мурас, 1997, С.7, 8.
- [15] 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амарканд, 2007.
- [16] а.Рузанов В. Д., “Еще раз о хронологии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РА*, 1999, № 4, С.24-37.
- б.Рузанов В.Д., “Морфолог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химико-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ого инвентаря Чуста и Дальверзи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МКУ*, вып.34, Самарканд, 2004.
- [17]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жилищ в памятниках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ИМКУ*, вып.33, 2002.
- [18]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расписной керамики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МКУ*, вып.30, Самарканд, 1999.
- [19] Иванов Г. 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и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я)*,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амарканд, 1999.
- [20] Алохунов А. А., *История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а (проблемы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философии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наукам, Андижан, 2020.
- [21] 古瓦里亚, Гувая, 中亚地区古代用于建造小规模建筑的一种土坯, 用黏土制作, 有时掺植物, 呈扁圆形块状, 经晒干使用。这种建筑材料在现在中亚地区的农村建筑中还普遍使用。
- [22] 帕赫沙, Пахса, 中亚地区古代独特的建筑材料, 用纯土在模具中简单夯打而成, 较之土坯质地软, 但规格较大, 长、宽可达50厘米。
- [23]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МИА, 118,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45-47.
- [24] 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амарканд, 2007, С.17.
- [25]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Основные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Чустского

- поселения в Фергане (1950-1982 гг.)”, *ИМКУ*, вып.19, Ташкент, 1984, С.58.
- [26]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Локаль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чус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Ленинград, 1985, С.6, 7.
- [27]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Бишкек: Мурас, 1997, С.7, 8.
- [28] Кузьмина Е. 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изделия э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АИ, М., 1966, вып. В4-9, С.93, 94.
- [29] Рузанов В. Д., “Морфолог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химико-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ого инвентаря Чуста и Дальверзи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МКУ*, вып.34, Самарканд, 2004, С.32-35.
- [30]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и памятники ранне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78, С.18-20.
- [31] Сришевский В. И., “Раскопки Чустского поселения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 1957 г.”, *ИАН УзССР*, no.6, 1958, С.70.
- [32]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и памятники ранне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78, С.33, 34.
- [33] Kohl P. L., “Central Asia (Western Turkestan): Neolithic to the Early Iron Age”, in: Erich R. W.(dir.),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vol.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Londres, 1992, pp.179–196.
- [34]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Бишкек: Мурас, 1997, С.74-76.
- [35] Hiebert F. T., “Chronology of Margiana and Radiocarbon Dates”, *IASCCA Information Bulletin*, no.19, 1993, pp.136–148.
- [36] Kohl P. L., “Central Asia (Western Turkestan): Neolithic to the Early Iron Age”, in: Erich R. W.(dir.),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vol. 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Londres, 1992, pp.179–196.
- [37] Görsdorf J., “Information zu den 14C-Datierungsergebnissen von Majdatepa (Bandixon I)”, *Trudy Bajsunskoj nauchnoj ekspditsii*, 2007, 3, p.132.
- [38] Johanna Lhuillier, *Les cultures à céramique modelée peinte en Asie centrale méridionale, Dynamiques socio-culturelles à L'âge du Fer ancien(1500-1000 av. n.è)*, Paris: Editions De Boccard, 2013, p.210.
- [39] Lhuillier J., Rapin C., “Handmade Painted Ware in Koktepe: Some Elements for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Northern Sogdiana”, in Marcin Wagner (ed.),

- Pottery and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Central Asia*, Warszawa, 2013, p.32.
- [40] 林铃梅:《新疆与中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彩陶类遗存对比研究》,《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3期第64页注31。
- [41] Рузанов В. Д., “Еще раз о хронологии чув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РА*, 1999, № 4, С.24–37.
- [42] Кутимов Ю. Г., Тутаяева И. Ж.,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плексы степного типа и проблема абсолютной датировки чув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ести*, Ин-т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АН, 2020, вып.20, С.29-42.
- [43] Jianjun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p.75.
- [44]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 [45]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398~4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46] Кузьмина Е. Е.,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ультуры Северной Бактрии”, *БДИ*, 1972, no.1, С.138.
- [47] Спришевский В. И., *Чувт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 истор. наук, Ташкент, 1963, С.12.
- [48]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МИА, 118,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200.
- [49] Исаков А. И., *Саразм, К вопросу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ран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еравш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раскопки 1977-1983 гг.)*, Душан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ниш”, 1991, С.88.
- [50] Аскарлов А., *Истори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Узбе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вод с узбекского, Ташкент: ИПТД «УЗБЕКИСТАН», 2018, С.176, 177, 182.
- [51] Максудов Ф. А., “К проблеме слож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яще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е”, *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Турана*, no.3, Самарканд, 2016, С.44-58.
- [52] Рузанов В. Д., Рогожинский А. 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изделий могильника Шагым”, *Археолог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2018, no.1(16), С.3–10.
- [53] Массон В. М.,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аргианы*, МИА, no.73,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9, С.114.
- [54] а.Массон В. М.,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аргианы*, МИА, no.73,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9, С.114-118.
 б.Киселев С. В.,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Кита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аучной командировки в КНР)”, *СА*, 1960, no.4, С.251-253, 264.
 с.Массон В. М.,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Древний В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 Л.,

- 1964, С.186.
- д.Антонова Е. В.,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в сб.: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С. Л. Тихвинского и Б. А. Литвинского, М., 1988, С.155.
- [55] Леонид Сверчков, *Тохары. Древни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ашкент: SMI-ASIA, 2012, С.44.
- [56] a.Francfort H. P., “The Cultures with Painted Ceramics of South Central Asi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Northeastern Steppe Zone (late 2nd–early 1st Millenium BC)”, in: *Migration und Kulturtransfer: Der Wandel vorder-und zentralasiatischer Kulturen im Umbruch vom 2. zum 1. 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Kolloquiums, Berlin, 23. bis 26, November 1999, S.221–235.
- b.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Xinjiang and Northwestern China around 1000 BC: Cultural Contacts and Transmissions”, in: *Migration und Kulturtransfer: Der Wandel vorder-und zentralasiatischer Kulturen im Umbruch vom 2. zum 1. 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Kolloquiums, Berlin, 23. bis 26, November 1999, Habelt, Bonn, 2001, S.67.
- c.Johanna Lhuillier, *Les cultures à céramique modelée peinte en Asie centrale méridionale, Dynamiques socio-culturelles à L’âge du Fer ancien(1500-1000 av. n.è)*, Paris: Editions De Boccard, 2013, pp.189–192, 257.
- [57]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 [58] Jianjun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p.75.
- [59]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398~4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60] Shui Ta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im and Fergana Basin in the Bronze Age”, in Victor H. Mair(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1,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pp.162–168.
- [61] 吕恩国、魏久志：《伊犁河谷地与费尔干纳盆地彩陶文化之交流》，见《伊犁河谷考古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
- [62]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Ферганы в эпоху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Бишкек: Мурас, 1997, с.96-98.
- [63] 林铃梅：《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前9世纪）新疆塔里木盆地与中亚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对比研究》第446~448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 [64] Miller M. F., Spengler R. N. and Frachetti M., “Millet Cultivation across Eurasia: Origins, Spread, and the Influence of Seasonal Climate”, *The Holocene*, 26(10), 2016,

- pp.1569–1572.
- [65]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Древне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МИА, 118,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С.75.
- [66] Zadneprovsky Y. A., “Early Urban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sia”, *Iran*, XXXIII, 1995, pp.157–158.
- [67]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 А., *Чус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Ферганы и памятники ранне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78, С.42.
- [68] Матбабаев Б. Х., “Чуст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в сб.: *Древние города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Ш. Р. Пидаев, Ташкент: Фан, 2008, С.50.
- [69] Абдуллаев Б. 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фортификации Ферганы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кон. II тыс. до н.э.-нач. II тыс. н.э.)*,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амарканд, 2007, С.17-19.
- [70] Литвинский Б. А.,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Ранов В. А., *Древности Кайрак-Кумов (Древн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ного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1962, С.6.
- [71] Литвинский Б. А.,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Ранов В. А., *Древности Кайрак-Кумов (Древн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ного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1962, табл.110.
- [72] Салтовская Е. Д., “О погребениях ранн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Фергане”, *КСИА*, вып.154, М., 1978, С.95-99.
- [73] Литвинский Б. А.,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Ранов В. А., *Древности Кайрак-Кумов (Древн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ного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Душан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1962, С.171.
- [74] Кузьмина Е. 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изделия 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АИ, М., 1966, вып. В4-9, С.94.
- [75] Иванов Г. 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Ферганы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и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я)*,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амарканд, 1999, С.16-19.

林铃梅：中亚楚斯特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Chust Culture in Central Asia

Lin Lingmei

KEYWORDS: Central Asia Fergana Basin Chust Culture
Painted Pottery Bronze Age

ABSTRACT: The Chust culture is presently the earliest known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he Fergana Basin of Central Asia, dating back to the late Bronze Age, roughly from the end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st millennium BCE, with handmade painted pottery as its prominent fe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ust culture extends not only to understand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late Bronze Age in Central Asia but also to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our understanding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status in Central Asia has been insufficient, resulting in discussions on related issues being limited. In recent years, some Chust culture sites have been re-excavated, yielding important new materials that have revised and expanded our previous understanding,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study of the Chust culture.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Chust culture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on related issues.

(特约编辑 洪 石)